

引 言

琅邪(yá)王氏在汉魏之际成为名门望族，奠基人是王祥。关于王祥的家世，《晋书》本传说他是汉谏议大夫王吉之后，祖父王仁，父亲王融，没有详列王氏世系。王氏后裔王繇、王璿、王珣、王搏，在唐代位至宰相，宋代欧阳修撰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时，追叙琅邪王氏的姓氏来源，并详列王氏历代先人，其根据已不得而知。而王祥出自汉代王吉，则较为明确，因从王吉说起。

琅邪王氏的远祖王吉，是琅邪皋虞人。皋虞是汉代的侯国，后改设为县，其地在今山东青岛即墨市的东北部。王吉的后人迁移到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，在今山东临沂兰山区的沂河岸边。沂河发源于今蒙阴北界牛角山北麓，流经临（沂）、郯（城）、苍（山）平原，进入今江苏北部。沂河两岸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是汉晋时期富庶地区之一。秦汉以后，许多著名家族纷纷从外地迁入，如东武（今山东诸城）诸葛氏

迁至阳都（原临沂北境，今属沂南），鲁国（今山东曲阜）颜氏迁至临沂西境（今属山东费县）等。王氏家族迁移时间以及迁移的具体原因，历史上没有记载，今已很难说得清楚。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说王吉“始家皋虞，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”。琅邪郡治所由东武（今诸城）移至开阳（今临沂），辖有今山东半岛的东南部，而王吉曾为郡吏，其家随官迁居也是可能的。皋虞滨海，临沂也滨海，自然环境十分相似，而皋虞偏处一隅，临沂交通却较为发达，并在汉以后渐次成为琅邪郡（国）的政治文化中心。王氏择地而处，落籍临沂应是十分自然的事。

王吉子孙繁衍，汉魏之际已形成影响一方的大族。王氏家族以儒学传家，其裔孙祥、览等都以孝友著闻全国。自王祥始，琅邪王氏以孝友传家，并形成王氏家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。王祥由魏入晋，位至国公，本家子侄王戎、王衍在西晋都位至宰相；琅邪王氏成为魏晋时期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。从此“琅邪临沂”就成为这一家族的“郡望”。南迁之后，他们在其侨居地仍称本籍；隋唐之后，其散居各地的后裔也以称其郡望为荣。这一文化心态，使琅邪王氏的后裔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保持着其家族文化的传统，并使其家族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。

在魏晋时期，郡望是一个家族的荣耀和社会地位的标志。今属山东的王氏郡望还有东海（郡治郯城）、

北海（郡治营陵，今昌乐东南）、高平（郡治巨野）、东莱（郡治莱州）、东平（郡治无盐，今东平东）等。这些地方的王氏家族也都出了不少著名人物，如东海郯王朗、王肃父子，北海剧（在今山东寿光南）王猛，高平王粲、王弼，东莱王基等，但绵延最为长久、影响最大的则是琅邪王氏。琅邪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簪纓蝉联，冠冕不替，地位显赫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、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曾做出卓越贡献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影响极为深远。

一 远祖王吉

王吉（？—公元前 48 年），字子阳，西汉名臣，是一位直言敢谏、极富责任感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位明通经学、有著作传世的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。《汉书》曾为他立传，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及著述。

（一）王国佐吏

王吉一生经历了武、昭、宣、元四朝，这正是西汉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期。他生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汉武帝时代，从小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和激励，勤奋好学，以通晓儒家经典著闻乡里。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建议，士人即知识分子只有通晓儒家经典才能入仕为官。汉代的选官制度，是由乡里推荐，郡国选送。王吉早年为琅邪郡吏，品德优秀，又通晓儒家经典，所以就被推举为孝廉，又由孝廉任为郎（帝王侍从官的通称），侍从皇帝。孝廉是

汉代选官的科目之一。顾名思义，选举的孝廉首先要具有孝顺父母的良好品质。汉代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，把家庭伦理推广到政治层面，提倡所谓“孝道”，说要“以孝治天下”，皇帝谥号前都加“孝”字。因此，把是否具有“孝”的品德作为考察入仕官吏的首要条件。由孝廉任为郎，也就成为汉代士人入仕的必由之路。王吉由郎官起家，补少府属官若卢右丞，升为云阳（今陕西淳化）县令。后来又因“能言极谏”，即敢于批评时政或揭发、弹劾不法官吏，被举荐为“贤良”，任为昌邑王的中尉，负责昌邑境内的治安。

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，其封地在今山东金乡一带。刘贺是个贪图享乐的贵族子弟，整日在封地内驾鹰走狗，驰逐游猎，游乐无度。王吉深为忧虑，屡屡上疏谏阻。王吉所上谏疏，恳切、周详，严肃指出由于昌邑王终日游猎，使境内农民不能正常从事耕桑生产，并使自己的健康受到影响，建议他认真学习古代历史经验，以古代圣王为榜样，学习他们治理国家的方略和经验。但刘贺根本听不进去，仍然我行我素，照样游乐无度。刘贺虽不听其劝告却十分尊敬王吉，对他直言谏诤还曾进行奖励。王吉作为王国属吏，恪尽职守，时时直言劝戒，也受到昌邑国内人们的敬重。

汉昭帝没有儿子，按照封建宗法，应由昌邑王刘

贺入继帝位。昭帝死后，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即皇帝位。临行前，王吉上书告诫刘贺，既是入继一定要尽人子之谊，对昭帝尽哀；大将军霍光功高勋著，对他一定要尊重。但是刘贺自以为既为皇帝，从此便无人敢于管束，根本不把王吉的劝告当回事。刘贺进入京都长安东门外，主管礼仪的官员就告诉他：按照礼仪，凡皇族奔丧者，望见国门都要恸哭，而刘贺却说他正闹嗓子痛，不能哭。既登帝位，刘贺旧习复萌，任性胡为，特别是在宫内不顾伦常，与昭帝的妃嫔淫乱，即位二十七天就被废黜了。按照当时律条，诸侯王有罪，所属群臣不谏诤、不举报就要被杀头，王吉和郎中令龚遂虽为昌邑旧臣，但平时忠直敢谏，因得免死，只处以髡刑（剃发），罚去守城三年。这种刑罚较轻，刑满后还可以被任用。

（二）著名谏官

刘贺被废黜后，汉武帝的曾孙病已（即刘询）立为帝，是为宣帝。宣帝时，王吉曾任益州刺史，因病去官，朝廷又征为博士、谏大夫。在汉代，博士、谏大夫都属内朝官，由皇帝直接任命、派遣而不专任行政职务，但因其可与皇帝接近，对于朝廷政事可以直接参与讨论，能发挥外朝官员（负有行政责任的官员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。博士是皇帝的顾问官，能参

与朝议，与谋军国大事；谏大夫是言官，可随时对王朝所实行的政策法令提出批评，对朝臣的不法行为进行弹劾，也可直接上书皇帝，提出有关建议。而大多言官却是当言不言，逢迎拍马，歌功颂德，成为王朝政治清明的点缀。王吉生性鲠直，忠于职守，他不甘于做朝廷的陪衬，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，只要他认为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表现，就提出批评建议。譬如当时宣帝有意模仿武帝，大修宫室，盛饰车服，比昭帝都阔气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；皇帝追求奢侈，势必影响整个社会风气。同时，外戚许、史、王氏三家凭恃贵宠而不守法度，破坏了朝廷法纪。一是皇帝本人，一是皇帝的外家，一般谏官害怕触怒皇帝都尽量避而不谈。封建时代，皇帝被神化为所谓“真龙天子”批评皇帝的过失叫“撻龙鳞”弄不好就被治以“大不敬”之罪，丧命灭族。这种风险，王吉不会不知道，但他为了维护汉王朝的根本利益，针对宣帝奢侈、外戚横恣，还是挺身而出，上了《言政事得失疏》。根据他所追求的儒家政治理想，这篇疏所谈的核心内容，就是治理国家以及达到国治民安、天下太平的根本，即所谓政务之本和建太平之基。这个根本就是选官和重民。他认为朝廷经常下利民便事的诏书，对百姓有好处，百姓也表示感激，但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。而要把国家治理好，首先要从皇帝及其近臣做起。皇帝要想把国家治理好，首先要选贤任

能，尤其要注意选拔宫廷近臣。如果皇帝身边的近臣不正派，就难以教化其他大臣，更不要说老百姓了。其次是重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。他认为统治者不能轻视老百姓，老百姓弱而不可胜，愚而不可欺，国家应该真诚地对待他们，光靠刑罚处治不行。为此，要选择好左右近臣，十分审慎地委派他们的职任。选择好左右近臣，就能随时纠正自己的过失；选派好执行某项任务的大臣，就能宣扬朝廷的威德而令百姓信服。他建议宣帝根据孔子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”的教导，向公卿大臣及儒生进行礼制教育，以改变“质朴日销，恩爱寢薄（俭朴的风气一天天消失，伦理亲情渐渐淡薄）”的社会风貌。尽管王吉言辞十分恳切，也未引起皇帝的重视。

王吉极富政治责任感，在任谏大夫期间，对朝政以及社会风习多所批评。譬如他反对早婚的陋习及彩礼奢费的世风，上《婚嫁不宜太早疏》，认为早婚危害极大，未成年的男女还不知怎样为人父母就结婚生子，使后代难以受到好的教育并易早逝；嫁女娶妻过分奢侈的风气，使贫者难以嫁娶，影响生育后代。又如他主张选拔贤能任为官吏，而反对“任子”制度，上了《言宜明选求贤除任子疏》。汉初规定，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期满三年的，可任其兄弟或儿子一人为郎；外戚子弟也可任为郎。因此，“任子”就是一种变相世袭的任官制度，其目的就是维护和加强官僚和

皇亲贵戚的政治特权。王吉认为官吏子弟大多骄气十足，桀骜不驯，又不习经传，不通古今，他们居官治民，只能蠹政害民，贻误国家，应该明选求贤，废除任子制度。同时，他还上了《言制礼作乐疏》，提出裁减供朝廷官员游乐的设施，提倡节俭等。但是，他的这些批评建议因为触及到王公贵族的切身利益而不受欢迎，皇帝也认为他的言论迂阔而不符合实际，不予重视。王吉看到这种情况，就以病为由辞官归里。从这里也可见王吉的官品和人品。一般庸官只为利禄，钻营谋求，一心往上爬，而他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做官，如果自己的政见不被采纳，他宁可辞官不居。王吉与同郡另一位著名大臣贡禹为友，当时流行着“王阳在位，贡禹弹冠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只要王吉（字子阳）在官，贡禹就乐于出仕，说明二人有着相同的志趣。元帝即位，派使节征聘贡禹与王吉入朝；王吉年老，在赴京的途中病卒。贡禹在元帝时历官谏大夫、御史大夫，以对朝政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激烈批判著称。

王吉兼通《五经》，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。所谓“五经”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同时，他也通晓《驺氏春秋》爱好梁丘贺解说的《易》经。平素他以《诗》、《论语》教授生徒及他的儿子王骏，王骏又以其所学传于子孙，从而形成琅邪王氏的家学传统。

(三) 子孙贵显

王骏，继承家学，通晓儒家经典，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的正直敢谏的品格。起初，王骏也以孝廉为郎，经大臣陈咸、匡衡等极力推荐，升为谏大夫。曾奉命申谕（告诫）淮南宪王，受到皇帝赏识，被任命为赵国内史。王吉曾因为昌邑王官属而受株连，告诫子孙不要再做诸侯王官吏。王氏以孝传家，遵守祖训是当时所提倡的“孝道”的第一条。王骏遵守其父的戒条，在赴任的路上，以病为由，辞官归里。后来，被任命为幽州刺史，升为司隶校尉。在汉代，司隶校尉职级相当于州刺史，但职权较重，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京畿各郡。丞相匡衡的儿子昌醉后杀人，王骏又发现匡衡专地盗土（擅自盗用封地以外的土地），就上奏皇帝免了匡衡的官。匡衡曾向皇帝推荐王骏，对他有“知遇之恩”，但为维护国家法纪，他既不惧丞相高位，也不徇个人私情，表现出一个正直官吏应有的品格。王骏执法不避权贵，在朝野赢得赞誉。此后，王骏官运亨通，由少府（汉九卿之一）出为京兆尹（汉京畿地区最高长官），官至御史大夫（汉三公之一，地位仅次于丞相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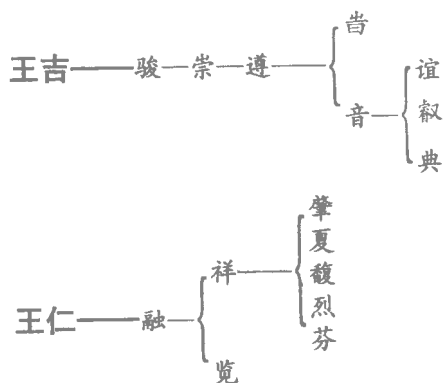
王骏之子崇，凭借其父的荫庇，被任为郎。历任刺史、郡守，有治理才干。哀帝建平三年（公元 4

年），由河南太守征入，破格升为御史大夫。王崇与解氏为亲家，而解氏为成帝舅安成侯夫人的外祖家。安成侯死后，其妻寡居，在长信宫供养，受宫内一罪案的株连而下狱。王崇上书为其解脱，哀帝认为王崇不忠诚，降其职为大司农（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，为九卿之一），转卫尉左将军。平帝即位，王崇代彭宣为大司空（即御史大夫），封扶平侯。当时王莽专擅朝政，王崇不乐与其合作，以病为由请求辞官归养，王莽遂乘机让他离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；一年以后，被其侍寝的奴婢毒死，其封地也被取消。其子遵，字伯业，东汉时官中大夫（皇帝顾问），封义乡侯；孙音，字少玄，为大将军掾（大将军的属官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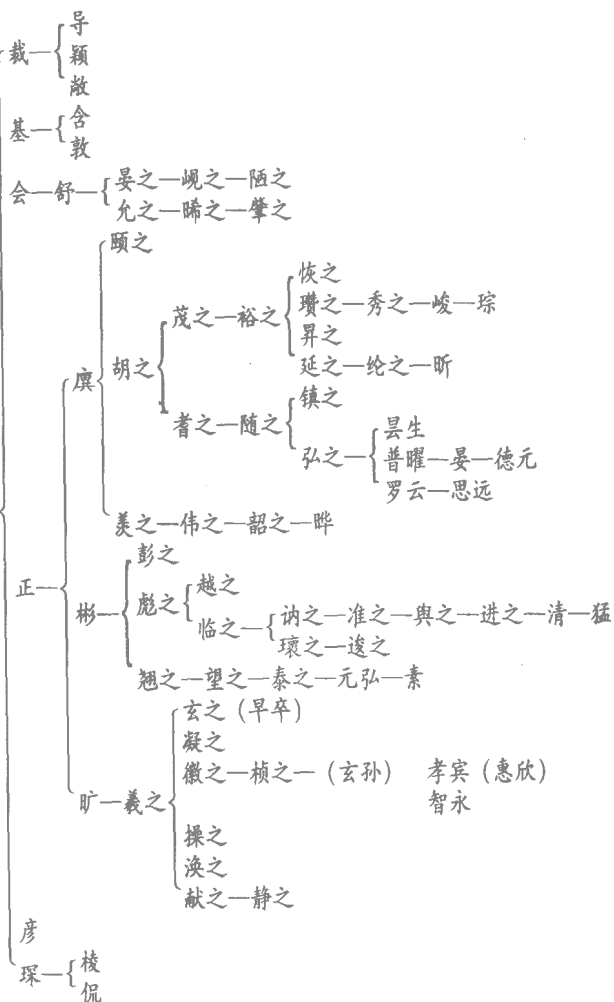
从王吉到王崇，三世通显。王骏、王崇均官至御史大夫，王崇封为列侯。王吉官位虽不至三公，也为当时名臣。琅邪王氏是西汉中后期由经学入仕而成为官僚世家的少数家族之一。这样一个以经学起家的文化家族，在其形成过程中，就逐渐形成自具特色的家族文化。从王吉到王崇，他们居官期间，从不贪取受贿，但食俸禄而已。虽居高官，而家无余财，迁移住处时，携带的不过随身穿用的一包衣服；辞官家居时，也是布衣蔬食，与平民无异。王氏祖孙三代的清廉表现受到人们的赞颂，也对其家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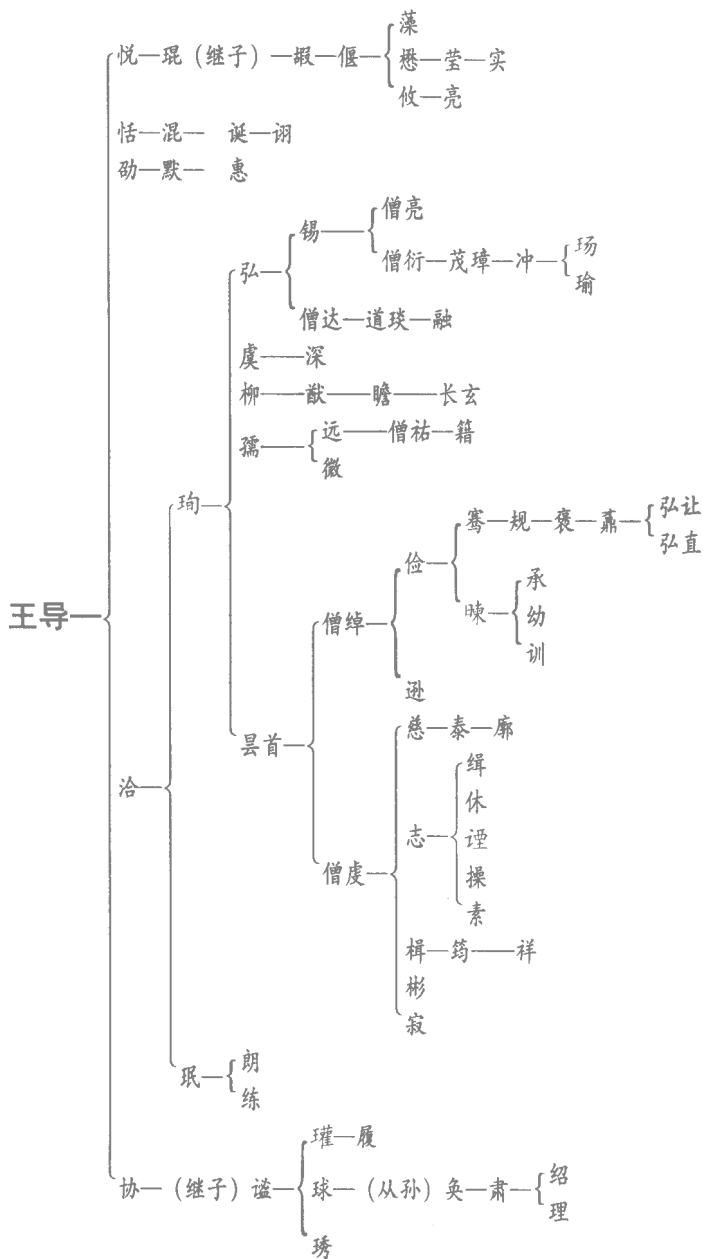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王氏世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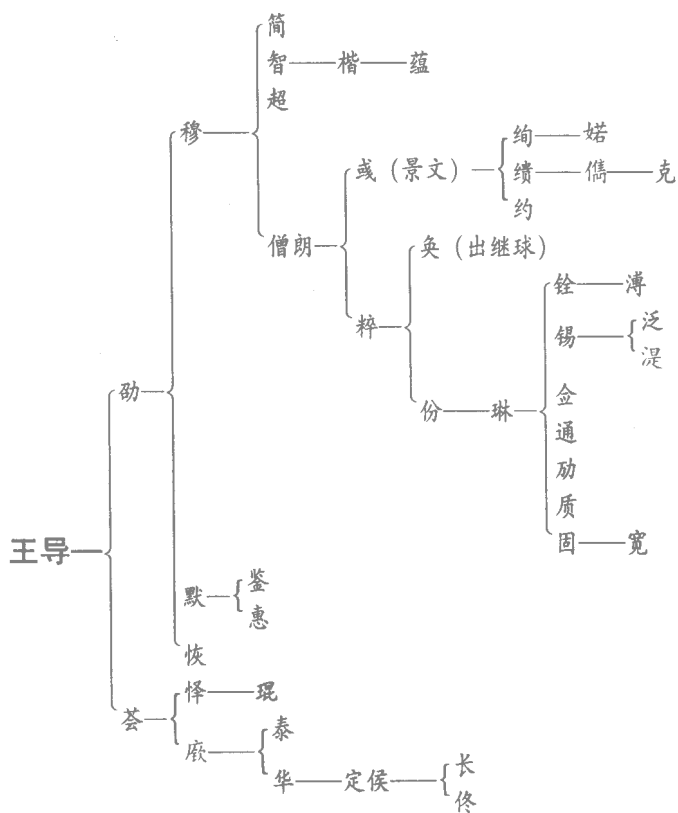
史传记载所列琅邪王氏世系，前后接续时间有些错乱。自王吉曾孙音之后，缺乏记载。因此，琅邪王氏在汉魏晋南北朝的世系分两段：自王吉至王音前后十分清楚，王吉后裔王仁一支的世系也十分清楚，而从王音到王仁则难以考定。或谓王仁为王遵之子，与王音为兄弟行；或谓王融为王音之子，而《晋书·王祥传》则云王祥其祖为王仁。今据有关记载，将汉魏六朝时期琅邪王氏的世列表如下：



王览







王雄 (祥族祖) — 浑 — 戎 — { 万 兴 }

惜

义 — { 衍 — 玄
澄 — 詹 (早卒) }

二 王祥中兴

琅邪王氏在王崇之后，长期默默无闻。东汉后期，王吉的裔孙仁曾任青州刺史，其子王融不应公府征辟，终生未仕。王融的儿子王祥由郡吏而位至国公，成为琅邪王氏的中兴之祖。

（一）避乱隐居

王祥卒于晋武帝泰始五年（269），享年 85 岁，可知他生于汉灵帝中平元年（184）。王祥的青少年时代，东汉政权风雨飘摇，黄巾起义虽被镇压，而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军阀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混战不已，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，国家多灾多难。其实，东汉从安帝、顺帝开始，就既不安，也不顺了。东汉皇帝大多幼冲即位，母后临朝听政。母后临朝，外戚得势；皇帝长大了，想要夺回政权，就利用宦官。外戚、宦官交相执掌朝政，彼此争权夺利，相互

厮杀，把朝廷搞得天昏地暗、乌烟瘴气。外戚、宦官不论谁掌权，都大量任用私人，干儿、义子满天下；朝廷贿赂公行，甚至公开在京都洛阳挂牌标价卖官。当时有一个师陀托关系前去晋见十常侍之一的宦官张让，便被误认为与张让有特殊关系，不少人就向他行贿，他就用接受的贿赂买了个凉州刺史。这种情形，只用“腐败”、“黑暗”实在难以形容。再加上老天不帮忙，不是涝就是旱，虫灾、风灾不断。战乱不已，天灾肆虐，受苦受难的自然还是老百姓。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顾百姓死活，照样横征暴敛。朝廷规定的一些好制度，如地方官员春天到乡间检查、督促春耕，问民疾苦，而这时也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机会，他们走到哪里，就蠹害到哪里，像群糟蹋庄稼的蝗虫。百姓活不下去，就铤而走险进行反抗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，全国遍地烽烟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从安帝永初元年（107）起，西北诸羌、南方诸蛮，以及青、冀、兖、豫、东莱等地的流民和农民就不断聚众起义（今山东地属青、兖、徐、豫、冀诸州）。永初三年（109），平原刘文河和张文光率领起义农民攻厌次（今山东陵县），杀县令；今山东东南部，泰山、琅邪一带，顺帝末年东郭窦、公孙举等聚众三万，攻城略县，震动地方，朝廷派兵镇压，也都被他们打败，直到汉桓帝永寿二年（156），才被中郎将段颎镇压下去。同时，地处海滨的琅邪，也是